



阮梅《罪童泪》：

用爱擦干“罪童泪”

□何 轩

打工经济,让中国城乡数亿家庭处于离散状况。父母外出打工,子女留守在家,形成所谓“留守儿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期一个特殊人群;留守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转型中出现的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问题。湖南作家阮梅的新著《罪童泪》聚焦留守儿童的一个异类——“罪童”,在11个“罪童”自述沉沦之路的基础上,以作家采访手记的形式,分别探讨11名“罪童”形成的原因与出路,为当下留守儿童预警教育敲响警钟,成为一部“成人与孩子共读”的罪童预警教育指南书籍。

《罪童泪》暴露出的留守儿童成长的教育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家庭暴力问题,外物诱惑问题,单亲家庭教育问题,精神抑郁问题,不良朋友问题,网络游戏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社会,有的来自学校,有的来自留守儿童自身。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要素来自家庭的离散、不和。

家庭的稳定与和谐是中国社会三千年稳定不变的基石,而维系传统家庭稳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与宗法伦理。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外来思潮的传播导致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中国的打工经济,则从经济基础方面瓦解了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和谐性。外出打工带来家庭结构的四分五裂,家庭成员一般只有在春节才能相聚。这种家庭形态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底层大多数家庭的常态。

家庭离散带来的直接社会问题是留守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问题。《罪童泪》以鲜活的纪实故事,呈现了中国家庭离散导致的未成年人的心灵变异、行为乖张,其中一些人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犯罪沦为“罪童”。《罪童泪》的第一篇《父亲》,讲的是一个年仅14岁的儿子,以自家铁锤砸死亲生父亲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儿子杀父之因,不是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是传统家庭暴力酿成的悲剧。父亲殴打儿子是传统家庭遗留的暴力陋习,而儿子砸死父亲,则是现代家庭伦理异化的苦果。《父亲》中,儿子的“家”建立在移动的“行船”上,它本身是变动不居的,使这个家庭处于不稳定的状况。父亲的“教子经”是:“谁打你,



你必须回打赢”,“是儿子就要会喝酒”。父子打骂是常态,夫妻争吵是常事。这种充满暴力的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催生这样的儿子杀父的家庭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父亲》的悲剧提醒成年读者,我们该怎样做父亲?我们该怎样教育儿子?我们该怎样给儿子一个和谐的家庭?

家庭离散的一个极端特征是单亲家庭的增多。而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与教育问题,更是全社会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裂变》讲述了这样一个单亲家庭儿童成长的悲剧故事:余成,15岁,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顿,他在遭到继父殴打、继母侮辱后,一时冲动持刀抢劫。原本想抢个做生意的本钱养活自己与生母,结果一不做二不休,使一个5岁男孩永远失去了疼他爱他的母亲。据作家狱中调查,像余成这样的重刑犯,9成来自单亲家庭。可见,完整而和谐的家庭,对于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多么重要。

家庭离散不仅给留守儿童一个虚无的家庭空间,而且给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带来影响,那就是患精神抑郁症的孩子增多。留守儿童精神抑郁,不仅影响其身体健康成长,而且还可能滋生出意想

不到的社会犯罪问题。《心障》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在当时,我以为考试成绩不好,一切都完了,一心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想过割腕,想过服毒,恰恰就在我的情绪不稳定的这段时间,我碰到了那个受害者。”——魏文,农村留守儿童,17岁入狱。因养成好斗恶习,又身陷严重抑郁症不能自拔,用一把水果刀刺死同校男生,被判15年。

家庭离散,缺乏亲情的慰藉与物质的支持,还往往致使留守儿童极易受外界不良影响,交上一些不良朋友而走上违法犯罪之路。《骨刺》中的未成年犯,钟原,16岁,中专文化,父母在外地鞋厂做高管,系城市留守儿童,典型的叛逆性格,盗窃、抢劫、打架、性游戏、网络成瘾等“五毒”俱全。2011年5月因抢劫罪进看守所,2012年3月进未成年犯管教所。《留守》中的未成年犯的故事更耐人寻味:“我妈妈每次回来都对我说,要我交友慎重,心事放在学习上,可我当时听不进。到了这里我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可是,已经迟了!”——鹏程,14岁,一个从小有着工程师梦想的留守男孩,只因为假期一个人在家很孤独,三次出门看“朋友”怎样抢的士司机的钱,结果把自己“看”进了看守所。

留守儿童的成长异化乃至犯罪,与当下网络环境的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是密不可分的。相当多的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生活分离导致亲情匮乏,情感孤独。而网络上泛滥的虚拟情感互动、色情影视、暴力游戏等不良信息,逐步占领留守孩子空虚的心灵。网络色情暴力对于留守儿童的不良影响胜于毒品海洛因。不少留守儿童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不仅荒废学业,而且毁灭身心,错误地把虚拟的网络游戏暴力搬演到现实生活中来,上演一系列真实的暴力犯罪案件。《游戏》中的少年吴用军即是一个典型案例。吴用军,小学四年级辍学,父母在浙江打工,为了逃避家庭的贫困与亲情的冷漠,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少年交往,陷入网络游戏之中不能自拔,被网络控制,逐步滋生了一种荒谬的真实生活的虚无感与虚拟中的自豪感。2008年10月25日,吴用军因与团伙一起在国道上持枪抢劫而入狱,年仅14岁。在狱

中分析其原因时,吴用军说,网络占70分,自己20分,家庭10分。

《罪童泪》不仅以11个罪童的故事呈现了当下留守儿童成长教育的种种问题,而且还以采访手记的形式,理性地分析了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探讨了解决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出路。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等社会组织,以及与家长、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等相关人员的齐抓共管。《罪童泪》以诗性正义的姿态深入各个“罪童”的内心世界,在家庭层面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维度,为留守儿童预警教育指明方向。这就是,一要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二要强化家庭的沟通功能。

留守儿童沦为“罪童”,在作家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与不当。因此,强化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功能,使孩子在家庭中学会适应社会,学会参与社会所需要的技能、知识、价值观和道德观,就极为重要。而要避免留守儿童沦为“罪童”,更要强化家庭的沟通功能。这种沟通表现为父母与子女的双向理解。一方面,做父母的要设身处地想孩子所想,要了解孩子的心理,要宽容孩子的失败,要在孩子成长路上给予更多的精神鼓励与物质帮助。另一方面,做子女的要理解父母的心,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自觉抵制来自外界的不良诱惑,与父母保持心灵的交流,平安度过“叛逆期”。

家之于人为何物?我们该如何做父母?做子女?如何给子女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如何教育子女?在我们这个特别重视家庭伦理的国度,上述家庭问题,现在竟然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家阮梅继承中华文明传统家庭爱的哲学,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充满诗意的家庭伦理自然生态关系图:

家是社会的细胞,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更是孩子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爱之树。而父母,就是家庭这棵爱之树上懂得开枝散叶的生命主干。孩子从这里吸收营养,承接风雨,终将走向自己的枝头,开自己的花,散自己的香,实现自己的梦想。

■简 讯

伟大也要有人懂

3月5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毓海教授来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给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近千名师生讲述了一场题为“少年读马克思”的主题讲座。

讲座围绕着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一书内容展开,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青少年介绍了马克思的个人成长轨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代表性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等的主要观点,恩格斯、黑格尔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现代文明、资本与金融、马克思对中国的意义等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展示的哲学、经济学思想,以及马克思对人类学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书中,韩毓海教授以提问的方式引出话题,并从马克思的书中提炼和把握马克思博大的思想,通过让伟人与青少年对话的方式,拉近青少年与伟人的距离,让青少年更愿意去了解、更感兴趣去领略马克思思想的魅力,学习到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方法,从而坚定理想信念,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青少年朝着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前行!

(李墨波)

“YA”书系致力于弥补青少年图书出版结构的缺失

3月1日下午,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召开了“YA文学和青少年图书出版展望”座谈会。“零时差·YA”书系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成立集团后努力打造新品牌的尝试之一,读者对象定位为13—17岁,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共同投资的麦克米伦世纪公司编辑出版。现已出版《托德日记》和《宠爱珍妮》,今年还将陆续出版《灵魂的旨意》《夜晚守护者》等十余种图书。

“零时差·YA”书系的推出既是对美国图书馆服务协会文学分级的一种借鉴,也是基于对当下中国少儿文学出版业态的调研、判断。当前的出版业态比较偏向低龄读者,“冷落”了青春期的少年读者。出版社希望对此失衡的状况有所改变,试图通过“零时差·YA”书系的出版,唤起更多的出版人对这一文学出版物类型的重视,为儿童文学出版生态平衡发出先声,弥补当前青少年图书出版结构上的缺失,从而使青少年文学出版达至更为合理有序的状态。

(童文)



吴然——云南儿童文学提灯人

□再隆中

大约30年前,云南集结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自称手的儿童文学样式,书写脚下这个神奇美丽、生机盎然、生长快乐的乐土,这些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多元的民族文化、多彩的生态文化、和谐的宗教文化、时尚的现代文化的儿童文学作品,一经出世,便引来外界喝彩甚至惊呼:云南崛起了一道新山脉!它改变了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云南儿童文学命运,改写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版图。这个作家群体给自己取了好听的名字:太阳鸟!热爱光明自由的太阳鸟,像会飞的花朵,飞翔在七彩云南圣洁的天空,由此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异数。最先提出并阐述“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概念的吴然,也是这一群体最突出的作家之一。

30多年过去了,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走进文学史,成为一个名词,一种现象,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吴然,是云南本土儿童文学岗位上,历经半个世纪依然宝刀不老的坚守者。时光会改变人的容颜,不能改变的是吴然对儿童文学的痴迷和对小读者的钟爱,他的童心、童趣,他的谦和、善意,他对美的敏锐发现,对诗意的开掘追求,贯穿在他全部创作中,所有生活细节里。他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和人格魅力,成为事实上云南儿童文学的提灯人——尽管,他个人从来无意于此。

吴然是为儿童文学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家。从1960年开始在地方报纸发表作品,到即将付梓出版五卷本《吴然文集》,50多年来,他创作发表出版了数百万字儿童文学作品。他主要致力于儿童散文、散文诗写作,兼及儿童文学评论。吴然相信“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做好一件事”的朴素之理,深耕精耕自己选定的园地,创造出以质取胜的奇迹。他对儿童文学倾注心血的另一方面,体现在编辑工作以及不断发现和培养儿童文学新人方面。在在职时,他其实只是一个职业编辑,业余作家;退休后,他更是宁可自己少写或少写,也要将时间和精力花在扶持本土儿童文学新人之上。多数时候,他默默俯下身,甘为人梯;一遇机会,他也会为复兴儿童文学而振臂鼓舞;在他一次次上书中,吐露了他对云南儿童文学曾经后继乏人的强烈忧患,以及提振士气,打造升级版的多方良方。受他恩惠的后学无数,刚刚在浙江出版自己第一本列入冰心奖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的青年作家蒋蓓,就在《后记》中动情地称吴然为“恩师”,蒋蓓这一声呼唤,代表了很多云南儿童文学新人的共同心声。

吴然是懂得浅语艺术真谛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尤其是主要以小读者为对象的儿童散文,有着自己特殊的艺术规律。这个规律,用台湾儿童文学前辈林良先生的概括,就是浅语的艺术。外行只看到它“浅”的一面,而忽略它特殊艺术的另一面,就贸然涉猎,往往成为不知深浅的莽汉,留下一堆烂稿,铩羽而归。细心如发用情极深的吴然不是这样,他进入儿童散文领域之前,不知道翻破了多少经典!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他达到深入浅出的自由境界,就像无招胜有招的武林高手,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吴然至今仍坚持手写日记,电脑扫描,将见到的好文章,新观点,将自己的心得感悟,一一记下,时时整理,并随时与同道和后人分享。

吴然的儿童文学梦,是希望有更多孩子读到他的作品,喜欢他的作品,最终让作品中那些瑰丽的想象、那些美文的情丝,去帮助孩子编织更加斑斓的人生理想。《歌溪》《小鸟在歌唱》《风雨花集》《珍珠雨》《大象树》《牵手阳光》《火把花》《踩新路》《走月亮》《我们的民族小学》和《花朵说悄悄话》……一本一本童书,从吴然手中如甘冽清泉汩汩而出,又被大陆和海外多个教科书版本编辑慧眼所识,吴然居然有六七十篇(次)作品入选不同版本教科书!有小读者就有吴然的小读者,而且这些小读者会背诵他一篇又一篇美文:“哟,水珠们是种到地里去了吧!地上能长出小草,长出小树,长出小花朵、小蘑菇,也能长出亮晶晶的水珠吗?哦,我把水珠种到地里去了!”这是去年4月,我随吴然在云南洱源一所不通公路的梨花村小学,亲眼所见的一个场景。那些一脸稚气的白族、彝族和汉族孩子,当知道课文作者就在眼前时,个个都变成人来疯,争先恐后地要在“老师的老师”跟前显摆,比歌声还响亮的朗诵声差点掀翻了教室屋顶!就在不久前,吴然以70高龄踏访雪域高原西藏,饱览美景之余,他随意走入一所藏区小学,碰巧的是,孩子们刚刚诵读过他的《我们的民族小学》!那些脸膛黑红的藏族孩子和老师,围在吴然跟前合影、欢笑——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奖赏吗?吴然那一脸灿烂的笑容,已然给出答案。吴然借助课本,看似不经意间,实现了找到最多小读者的梦想。

一些时候,后辈会叫吴然“白发男生”。从青丝到白发,是岁月留下的印痕。吴然因童心而不老,因儿童文学而收获了人生最大快乐。吴然心怀善意、宽和待人,这既是他本性使然,也是他选择儿童文学为毕生事业的必然结果。他以诗意的童心,打量这个其实并不如他笔下那样美好的世界。也许他早就知道,以强悍文风去对抗现实的某些丑陋并不是自己的强项,也不是以低幼年龄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儿童散文所能完成的使命,因此他特别看重并鼓励年轻作家书写美丽风景背后的苦难,少年视角中复杂多义的世相,体现儿童文学应有筋骨和力道的作品。吴然看上去瘦弱,他也常常自谦其渺小,但是他以谦卑之心为文为人,秉持良知坚持真理的修为品性,自成一格,更让我心存敬意。

■童心世界



儿童版画 未来星树

儿童文学评论

·第371期·

